

# 思想的争锋

## ——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大论辩(1901—1919)

韩 强

(南开大学 哲学系 天津 300071)

**摘 要:** 1901 年到 1919 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辛亥革命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围绕这一主线,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对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和封建礼教的批判,这一批判又涉及对孔子的评价。其次,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麦孟华等对奴隶性的批判,最早提出要树立国民意识,而要树立一种新的国民意识,又涉及科学、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以及文化革新方针的争论。再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关键词:** 天命观 无神论 封建礼教 国民性 科学 民主 文化革新

1901 年到 1919 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现代哲学》一文中把近代文化思潮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 1898 年变法运动时期,基本精神是“按照旧文化来理解和评论新文化”。第二是 1919 年掀起高潮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基本精神是“用新文化批判旧文化”。第三是 1926 年以后的民族运动时期,基本精神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注意的是中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批评”。而我们认为,近代文化思潮的变化应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898 年的变法运动,基本精神是“按照旧文化来理解和评论新文化”,其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个时期,是从 1901 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前,其基本精神是以辛亥革命为主导的民主共和思想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第三个时期是从 1919 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到 1930 年的中西文化论战,基本精神是“用新文化批判旧文化”。第四个时期是从 1930 年中国思想界提出用“现代化”概念代替褊狭的“西化”概念,把中西文化论战引向了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论战,其标志是 1933 年《申报月刊》发行《中国现代化问题专号》特刊,仅在 1935 年短短几个月就发表了 150 篇文章。大多数人都主张用“现代化”的概念代替“西化”的概念,并主张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主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第二,应吸取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民主,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欧美化”。第三,中国实现现代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四,在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这里,我们重点考察 1901 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的

思想变化。

1840 年鸦片战争使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从军事上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李鸿章、薛福成、马建忠等人的“变器卫道”则是进一步涉及了经济领域,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方的实业精神,力倡发展采矿、制造、铁路和贸易,希望能够在经济方面赶上西方,使中国富强起来。到了康梁变法,则是深入到政治制度,希望模仿日本明治维新逐渐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总起来说,从 1840 年到 1898 年,希望对中国进行改革的人们其思维方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 1901 年到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主线是辛亥革命,其根本目标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围绕这一主线,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对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和封建礼教的批判,这一批判又不能不涉及对孔子的评价。其次,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麦孟华等最早提出要树立国民意识,而要树立一种新的国民意识,又涉及科学、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以及文化革新方针的争论。再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因此,我们认为,从 1901 年到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实际上是一个过渡阶段。

### 一、尊孔与批孔之争

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充分利用了孔子,特别是他的“公羊三世”说,提出了一条君主立宪的道路。他的改良主义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是,随着变法运动的失败,他利用孔子来反对民主共和则走入歧途。正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是一位富有宗教情怀的宗教家。在他的思想中,佛教思想有之,基督教思想有之,孔教思想也有之。人们也知道,他的“保教救国”所要保的是经过他改造过的孔教。这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国

收稿日期 2007-10-28

作者简介 韩强(1948—)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情所决定的,因为到康有为的时代,中国的尊孔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孔子早成了人们时时宗奉的“至圣先师”。康有为清楚地知道,“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为集合国民人心,增强民族凝聚力,“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指出:“先生之布教于中国也,专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弃,实民俗历史之关系,不得不然也。”“诸教虽各有所长,然按历史、因民性,必当以孔教治中国。”

章太炎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代表。对康有为倡导保教,“以神秘性说孔子”,他尤其不赞成。他与梁启超同在《时务报》供职时说过:“章尝叩梁以其师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时,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唯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梁启超反对“保教”说是从章太炎那里受到的启示。

梁启超在20世纪初首先举起批孔的大旗。他指出:“孔学不适于新世界多矣。”他认为,任何古圣先贤的学说都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的产物,是具有时代性的,未必都符合今天的需要,所以他提出,对于圣贤的学说,应采取“可者取之,否者弃之”的态度。

革命派的批孔,以章太炎最为激烈,影响也最大。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馥书》中的批孔言辞极大地激励了革命人士,同时也引发了更为猛烈的批孔浪潮。从时间上说,革命派的批孔大致从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时期革命派的批孔与改良派的批孔相比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抛开尊孔的外衣,直接举起反孔的大旗;二是将反孔斗争与政治上的批判君主立宪、宣传民主共和紧密联系起来;三是批判的范围更广泛,天命论、有神论、君权神授说、厚古薄今的思想、男尊女卑的观念,都在批判之列,其中批判的重点是“三纲五常”。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的最终目标是当“中华帝国”的皇帝。为实现其复辟帝制、颠覆共和的政治目的,他一方面排挤革命党人,进一步攫取权力,另一方面,在思想领域鼓吹复古尊孔,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为其复辟帝制大造舆论。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即颁布《整饬伦常令》,提倡封建礼教。

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帝制活动与康有为、陈焕章领导的孔教运动相合流,使革命派建立不久的民主共和国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给作为封建专制灵魂的孔教带来了灭顶之灾。它不仅使人们看清了孔教与帝制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使思想先驱们找到了在学习西方道路上屡遭失败的原因。他们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仅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学习西方是不行的,还要从思想层面去学习,因此,这就要求在中国要进行一场思想(或伦理)上的革命。陈独秀把这一认识称为“伦理的觉悟”,“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思想的革命(或伦理的革命),其对象就是孔教。陈独秀在当时即明确指出:“孔教问题,方喧嚷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批孔反儒的面目闪亮登场的。反孔斗士们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在非孔议孔上尽显身手,大展英雄本色。

“打倒孔家店”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新文化运动批孔的总口号和代名词,也正因为这一点,很多人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全盘性反传统”的错觉。事实上,这一口号是人们对胡适“打孔家店”一语的讹传。而且,从这场运动的实质来看,用这一口号来概括也是不恰当的。李大钊在1917年写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明确指出:“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且倡民权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而无如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何也!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 二、批判旧道德提倡新的国民性

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再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改良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派对封建礼教和旧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改良主义者康有为首先举起了批判旧封建道德的旗帜。他以“求乐免苦”的人性论展开了对封建“三纲”的批判,把是否有利于人、是否满足人们“求乐免苦”的要求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里,“求乐免苦”与“不忍人之心”是融合在一起的。他甚至把“不忍人之心”也说成是一种欲望,把发扬“不忍人之心”说成是一种求乐的行为。所谓“乐”,既有物质之乐,也有精神之乐,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有“凡俗之乐”与“高尚之乐”。“凡俗之乐”,就是满足日常生活和名利地位之乐,而“高尚之乐”,就是“自苦以乐人”,发扬“不忍人之心”。在康有为看来,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每个人的祸福利害是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的,“其进化耶则相与共进,退化耶则相与共退,其乐耶相与共其乐,其苦耶相与共其苦”。因此,每个人不应该只顾个人之乐。康有为认为,每个人都自觉地发扬不忍人之心,就能做到“相与共其乐”。

康有为反对封建家族制度,反对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观念,要求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他认为封建家族制度是社会进化的障碍,并断定随着社会进化、人类进入大同,家庭必将发生变革,人们的伦理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康有为还认为,妇女地位的高低,与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人道稍文明则男女稍平等,人道愈野蛮则妇女愈遏抑”。由此,他又进一步认为,世界的文明进化以至走向世界大同,应当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开始。他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问题提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些思想无论是在改良主义运动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都有进步意义。

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代表。“新民说”用西方流传的“社会有机体论”来探讨中国贫穷的原因,其目的是要宣扬中国的自强自立。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代贫穷不振,是因为中国人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素质太差。要使中国走向富强,中国人民就必须从三方面来一番自新,这包括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只要中国人人自新,做新民,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了。所

以,他说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如果说清末的改良主义者还希望通过君主立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么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则是要彻底推翻封建统治,走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们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更加猛烈。章太炎、孙中山等革命者更充分地利用资产阶级的新思想,系统地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旧道德进行批判,其目的是唤起民众。

章太炎认为,革命是伟大艰巨的事业,要取得成功,革命党人就必须不畏艰险,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因此不可“夹杂一点富贵利禄之心”,必须保持、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精诚团结,这就需要提倡革命的道德。为了加强革命党人的道德修养,章太炎反对人们轻小德、轻私德。他认为,《论语》宣扬“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康有为宣扬“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都是不正确的,道德不应作大小公私之分,应该把大德与小德、公德与私德统一起来。他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必薄于公德”,因此,革命党人不可轻视“小德”、“私德”,而应该认真进行道德修养。在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大力提倡革命道德,鼓励革命党人自觉进行道德修养,这对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他的思想中也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

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坚定地认为,革命是改造旧中国的根本途径。辛亥革命后,他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革命不仅包括军事的奋斗,还包括宣传的奋斗、道德的心理建设。他说:“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他在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心理改造”和“感化人群的奋斗”,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用宣传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孙中山认为,人类要进化,国家要繁荣昌盛,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努力克服利己的思想,培养“公共心”。

“自由、平等、博爱”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同样在中国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也是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明确宣布: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他认为,三民主义“皆为平等、自由主义”,彼此是相通的。实际上,孙中山是把自由、平等、博爱融合于三民主义之中。

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再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改良派、革命派和新青年派不仅对封建的传统道德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新的国民性的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流亡到日本的思想家在海外接触到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著作,西方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观点,成为他们分析中国问题的出发点。视野的开阔使他们得以从更广阔的范围去考察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不同。如果说以前他们还主要是从国家制度(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政治思想(天赋人权与君权神授)等方面来比较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先进与落后,那么现在,他们则更多的是从文化的深层结构来探讨中国落后的

原因。通过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他们意识到,近代化转换实际上是包括工业化、民主化及国民心理改造这三个方面复杂的社会转型。要实现近代化,孤立地建立资本主义政治或经济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社会文化的革新、国民意识的更新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与其说是中国落后了,不如说是中国人落后了,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人的观念落后了。为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大力清算积淀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奴隶根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培育、树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首先就是要“去社会旧习之污”。为此他先后写成《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文章,尤其是在其专著《新民说》里,对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积淀在民族灵魂深处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他认为,归纳起来,这种劣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国家思想。第二,缺乏权利观念。第三,缺乏自由思想。第四,缺乏社会公德。梁启超在充分地论证了新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一个理想模式,即发扬中国民族精神之精华,补以他国国民精神之精粹,以涤除国民劣根性,重铸新国民。

辛亥革命之前,在中国政治和思想舞台上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样,革命派也认识到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在革命派看来,正是中国人身上所积淀的奴隶的劣根性使之既泯灭了自我意识,同时也泯灭了国家、群体观念,造成中国人缺乏权利思想、自由思想和社会公德,没有合群习惯等,处于一种无政治意识的冷漠、麻木状态。革命派对奴隶性予以猛烈抨击,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人心中树立新型的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使之“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

《国民日报》在其发刊词上公开宣称,“以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适(铃)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诸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吠,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呼吁:“吾闻日本立国之原素,由人人抱有所谓‘大和魂’者,吾中国之士民,相安于不识不知之中,其灵魂之失丧也久矣。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既终,乃为楚言以招之曰‘魂兮归来!’除此之外,邹容的《革命军》以及革命派的其他时论如《说国民》、《中国之改造》、《论中国的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国民新灵魂》、《国魂篇》等,也都大量论及革除国民劣根性,铸造新国魂的问题。

革命派认为,要想重铸国民魂,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在民众心中“播国民之种子”。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中国人能否树立国民意识、去除奴隶性,是关系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大问题。为了“立国于竞争之世”,革命派大声疾呼:“国民其早醒,国民其自立。”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国民是国家的主人。第二,国民享有各种权利。第三,国民应尽各种义



务。第四 国民自由平等、独立自主。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等,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国民的必备素质。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试图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来教育民众,从而促进符合时代需要的理想国民性的诞生。在这点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并无二致。国家思想、社会公德、权利观念、自由思想等既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国人所最缺乏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析,可谓既抓住了普遍性问题,也抓住了根本性问题。

### 三、批判天命论提倡科学民主

近代中国反天命论的斗争蔚为壮观,它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中国历史上沉积下来的天命论传统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以发表在《国民日报》上的《革天》为起点,以梁启超等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武器,反天命派与天命论的辩论如火如荼,双方争论的目的不仅是要不要天命论的问题,它的根本目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帝王统治的合法性问题。

《革天》一文,发表在1903年的《国民日报》上,是一篇驳斥天命论的战斗檄文。它首先指出,天命论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思想学说领域,另一种是在道德风俗领域。《革天》分别对这两个领域的天命论及其影响层层剥笋,并借助于一些科学知识进行反驳,树立了自己的观点。

《革天》一文认为,中西古今的关于“天”的学说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中国古代的“言天之说”,称为旧学说;一种是近代西方的天演论,称为新学说。在《革天》看来,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在强调天的作用上,虽与中国天命论有所不同,但它也有一个影响人类的天无处不在,在本质上与中国的天命论是相通的。天造设山川草木,天又使人摧之杀之,造设之天岂不是与杀害之天相矛盾?纵观历史,明明有些物种是在人的爱护下得以延续繁衍的,这与天有什么关系呢?用天择论是无法解释的。既然这不是天择,而是人择,那么就非一切都由天择。其实这样就得出天择和人择并行的结论。天变得偏而不全,这与天演论的“一切皆由天择”相矛盾,天择不能自圆其说。所以《革天》提出,天是不足凭的,要打破天择的陈腐观念,必须树立人定胜天、人定代天的思想。

《革天》是对封建思想系统批判的开端。在分析、揭露崇信天的学说和风俗的基础上,《革天》严肃地指出,为了中国的进步、同胞的幸福,必须“冲决无量之网络”,破除天命论,倡导人为。因此,必须革天,革天就是不为天保留任何地盘,把天的观念彻底地从人们的观念和信仰中革除。革天说的口号是人定代天、一切是人来决定的,它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天命的重压下解放出来。

新青年派认为,民主与科学既是新文化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近代欧美等国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民族而居于领先地位,就在于它们的“科学之兴”和“人权平等之说兴”,因此,“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青年派主张,要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用科学思想代替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他们认识到,民主与科学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一方面,假如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另一方面,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

导,那么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高擎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认定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同时他们又认识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派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向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猛烈开火,目的就是要为接受西方文化扫除一切思想上的障碍。

### 四、改良派、革命派与新青年派在思想战线上的争论

改良派、革命派与新青年派是1898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三个主要的派别。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新青年派提倡科学民主,因此这个时期的思想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些主题展开的。由于这个时期西方文化的传入,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与革命派和新青年派发生争论。当时的主要争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革命与改良、聚变与渐进之争

戊戌变法遭到惨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被当做失败的英雄受到热烈欢迎。孙中山等人主动找康、梁等人做工作,反复规劝他们放弃改良主义,与革命派合作进行反清斗争,但康、梁为了报答光绪的“圣恩”,始终不肯投入革命洪流。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后,积极向海外华侨推销自己的改良货色,着实迷惑了一大批人,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梁启超还竭力拉拢革命派人士,用“革命与保皇同出一途”的理论欺骗他们,把孙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组织。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极力鼓吹保皇,公开反对革命。

针对改良派对革命运动的污蔑,革命派的宣传家们撰写了大量文章进行批判,由此掀起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战。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痛斥了康有为的种种谬论,阐述了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指出中国人民要避免被双重压迫的命运,就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王朝,“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还有人以革命救国论驳斥了改良派革命亡国论,指出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说明改良派的主张是行不通的,顽固腐朽的清廷不可能真正实行君主立宪,只有革命才是救国的唯一途径。

1903年以前,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论战虽已开始,但尚未充分展开,这可以说是论战的第一阶段。1903年冬天,孙中山自日本抵达檀香山,看到许多革命团体遭到梁启超等人的严重破坏,不少人受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谬论的毒害,没有真正划清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界线。孙中山察觉到了改良派的阴谋,他于1904年发表《敬告同乡书》一文,拆穿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保皇、毒化革命的反动面目。他认为,康有为的目的在于“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塌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他明确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为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革命与保皇应该

“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他号召人们坚定地站到革命的一边来,与改良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

在孙中山的号召与推动下,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广泛的论战。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在美国的檀香山有《檀山新报》和《新中国报》的论战,在旧金山有《大同报》和《文兴报》的论战,在香港有《中国报》和《商报》的论战。此外,东京、上海等地出版的各种革命报刊,都加强了对改良主义的批判。经过这一时期的论战,越来越多的人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界线,认清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这一阶段的论战,为同盟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条件,也为以后的思想大论战揭开了序幕,可以称作论战的第二阶段。

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进入第三阶段,这是论战的高潮时期。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这次论战中充当了重要角色,革命派的许多战斗檄文就是在这里刊登之后传诵于海内外的。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阐明了革命派的根本立场,提出三民主义作为革命斗争的政治纲领,驳斥了改良派所谓“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的谬论。1906年4月,《民报》发表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文中列举了12条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分歧,后来革命派发表的批驳改良派的文章,总体上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经过一段时期的论战,改良派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感到理屈词穷,无法再坚持下去了。1906年11月,梁启超暗中授意同党友人徐佛苏,要他写一篇文章登报,呼吁双方停止论战。不久,《新民丛报》发表了徐佛苏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革命派主将章太炎指出,这种休战只不过是改良派“见异己之必胜,遁辞于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的一种欺骗手法。《民报》为此发表了《驳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揭露了徐佛苏要求停止论战的真实目的及其改良派面目,认为革命派对改良派的斗争决不会停止,并指出,如果《新民丛报》掌握了真理就不应该害怕争论,假如《新民丛报》妖言惑众,掩盖真理,《民报》就要辩论到底,并发誓一定要扫清改良派的歪理邪说,使他们不再有力毒害人民群众。经过激烈的论战,革命派最终占据了优势。这时的改良派已经众叛亲离,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许多改良派分子接受了民主革命的主张,加入革命派的阵营。曾经畅销于一时、为年轻人所喜闻乐见的《新民丛报》,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堕落成为清王朝的御用吹鼓手、民主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其销路顿减,影响力一落千丈。在一片反对声中,《新民丛报》不得不于1907年7月关门大吉。《新民丛报》的停刊,标志着改良派在论战中的彻底失败。《新民丛报》垮台之后,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继续展开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与清算,直到1908年冬天被日本政府查封为止。

从1902年开始,到1908年结束,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辩论期间,双方的主要人物都相继登场,其辩论之激烈、涉及之广泛、分析之深刻都是罕见的,可称为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的一道独特景观。在论战中,革命党死战改良派,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使民主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 (二)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之争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进大致经历过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这一阶段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有康有为的“孔教派”和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国粹派”;第二阶段在“五四”前后,这一阶段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有杜亚泉、钱智修、梁漱溟、章士钊、张君勱、吴宓、梅光迪等人的“东方文化派”;第三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中叶,这一阶段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有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派”;第四阶段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是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文化哲学派别,现代新儒家出现于“五四”期间,形成于抗战前后,1949年后活跃在港台地区,80年代在大陆学术界也颇具影响。

自清末民初到“五四”前后,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东方文化派”。“东方文化派”人士有几个共同或接近的文化观点。第一,他们耳闻目睹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以往对于西方文明的美好印象,尊崇西方文化的态度顿时消散。正如杜亚泉所说,往昔“依赖西洋文明,欲借之以免除悲惨痛苦之谬想,不能为之消灭”。“西洋之现代文明,乃不适于新时势,而将失其效用”。梁启超则更深入一层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生存斗争和个人本位理论的推动下,已经危机重重,险象环生。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金钱,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源实由于此。”第二,“东方文化派”人士都曾向往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现在目睹奇技淫巧、利器杀人的情景,于是一起惊呼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科学万能之梦破产。在这方面梁启超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说,西方“一百年物质的进化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仅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欧洲人“科学破产”的论调,引起梁启超等辈“科学万能”观念的破灭。第三,反观近代以来的艰难历程,东方文化派人士认为中国有特殊的文化背景、特殊的国情,因此不适宜全面仿效西方制度与文化。例如,章士钊就在《农国辩》中提出中国要在思想文化方面保持传统的东方特色,实行农国制度。这个所谓“农国”在经济、政治、道德、法律、习俗等方面,都是与“工国”不同的,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上“知足戒争”,政治上不实行代议制,道德文化上“说礼仪,尊名分,言器数”。他把自己设计的“农国”制度与文化称之为“贵平均之传统社会主义”,其持论的依据则是:“吾本农国,今其精英,虽微蚀于伪工制,而大体未坏。”这种看法在当时有一定的典型性。第四,他们提出了“东方文化救世”论。杜亚泉声称,中国固有文明为未来世界之指导者,“吾国数千年之固有文明,决不能为百余年来新产之西洋文明所破产……吾国五千年以前之旧文明,将流入西洋,发生二十世纪之新文明”。梁启超更是大声疾呼:青年们,立正,开步走,用“祖宗三大圣”的学说去“超拔”援助大洋彼岸“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人!应该指出,所谓“东方文化救世”论并不完全摒弃西方文化,而是主张东西融



合、新旧兼采 杜亚泉指出,“救济之道在统整世界文明”,“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文明,全世界之救济皆在乎是”。这些提法,对后起的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文化保守主义针对的是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由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联合进行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而这功劳,如实论之,是与当时提倡西学、新学的“西化”派是分不开的。

这场以思想启蒙为主题的文化革命,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功绩,但也有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具体说来有两方面:第一,西化派人物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进步的,因此,他们不仅接受、宣扬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进步文化,而且把帝国主义列强用以掠夺和奴役殖民地的思想文化,如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也错当成新文化来传播。第二,他们又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一无可取的。对于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他们也错误地当成了封建文化加以扫除。《新潮》的编者傅斯年在一篇答读者的信中说得很明确:“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因为中国文化落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这就很容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滑向全盘西化的泥沼。

“全盘西化”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29年,其代表人物是胡适和陈序经。此前,胡适已经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百事不如人”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派发生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继续坚持“西化”观点,进而发展为“全盘西化”;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坚决放弃“西化”主张,走向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 (三)无政府主义与三民主义之争

中国人最初接触到近代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始于20世纪初年。日本是中国人最初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中转站”。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思潮在日本十分流行,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思想被陆续介绍到日本。一段时间里,各种思想相互混淆,鱼龙难辨。无政府主义被日本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当做革命的、进步的思想加以接纳。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籍相继出版,如宫崎梦柳翻译的《虚无党》、烟山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等著作。这些著作除介绍无政府主义主张外,突出地介绍了俄国民粹主义派思想和活动。民粹主义派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是俄国反映小生产者利益的政治派别。他们以农民群众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他们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故得名“民粹派”。俄国民粹主义者竭力宣扬恐怖主义,主张组织武装暴动和秘密暗杀,通过恐怖活动扩大影响,引起社会革命。民粹主义派的活动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大批民粹主义者纷纷流亡国外,其中有不少人逃到日本后,与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密切交往并产生影响。俄国民粹主义

者虽然受巴枯宁思想的影响很大,但严格地说,民粹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将两者加以区分,在初期的一些著作里,“恐怖主义”、“民粹主义”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译名。这种情况自然影响到当时在日本接触无政府主义的中国人。

20世纪初留日中国学生热衷无政府主义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到了1907年,新问世的《新世纪》和《天义报》则形成了中国人传播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中心<sup>[1]</sup>。《新世纪》创办于法国巴黎,核心人物有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人。《新世纪》自1907年6月22日创刊,至1910年5月21日停刊,维持时间近3年,共出版121号。此外还出版了《新世纪丛书》第一集。《天义报》创刊于1907年6月,共发行19期。1908年4月另出《衡报》,实际上是《天义报》的继续。创办人、编辑人和大部分文章的执笔人是刘师培。巴黎《新世纪》与东京《天义报》天各一方,东西呼应地鼓吹无政府主义。虽然他们在宣传上各有特点,并在观点上有过冲突,但在反对强权、排斥国家政权、主张绝对自由以及提倡恐怖和暗杀等方面,思想是一致的。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形成热潮。1916年,无吾、求同、真风等人在南京组织“群社”。1917年5月,太侔、震瀛、竟成、超海等人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1918年,山西无政府主义者尉克水组织成立“平社”。1919年,上述三个团体组织与“民声社”合并,成立“进化社”,在上海出版《进化》月刊,宣传无政府主义。同年建立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还有“社会主义同志会”和“真社”。到了1922年和1923年,无政府主义团体大量涌现。约略统计,1922年为18个,1923年为40个。“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报刊也竞相问世。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期这一类刊物约达70多种。

从20世纪初中国人提倡无政府主义始,到1907年形成以《天义报》和《新世纪》为传播中心,再到“五四”时期形成热潮,传播无政府主义的人物角色不一。他们中有昙花一现式的过场人物,也有比较虔诚的信奉者,有心血来潮、借此获取资本的投机客,也有饥不择食、信手拈来的盲目张扬者。除刘师培的思想稍有继承者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宣传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你说你的,我唱我的,歧见纷立成为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显著特点。但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者有下列比较共同的主张。

第一,抵制强权,排斥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治组织、鼓吹极端个人主义。第二,仇视私有制度,描绘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图式。第三,强调人的社会公平地位,主张权利和义务均等。第四,提倡废“姓”,抨击宗法家族制度。第五,幻想革命即日成功,宣扬暴动、暗杀的恐怖思想。

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庞杂,其主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道德等诸领域。从本质上讲,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革命派的三民主义的。他们指斥民族主义是“复仇主义”、“自私主义”,民权主义是“自利主义”,也反对“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民生主义,更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他们仍主张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非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背驰者也,不过稍有异同

耳”,民主革命仅求一国一族少数人之自由平等幸福,无政府革命乃求世界人类自由平等幸福,两者犹行程之有远近,而非背驰之也。因此,虽因主义不同,但“无碍其同为革命党”,主张“合力以应敌”,“合力以达革命同一之目的”。这种合力论使《新世纪》的一些人与孙中山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有较密切的交往。

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先进思潮的主流之前,无政府主义虽然具有不赞成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极一面,但其与专制统治势不两立的姿态构成了无政府主义进步意义的主导方面。而当无政府主义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手时,其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成为主导方面。然而,问题在于,不管是清王朝、袁世凯政权,还是“五四”时期北洋军阀的统治,专制的邪恶已成为众矢之的。这种基本的社会氛围,使无政府主义的这些思想主张,很容易诱导人们将它作为反抗专制、憧憬光明的精神支柱。

面对无政府主义的攻击,革命派进行了反击。孙中山指出,“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Utopia),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传说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sup>[2]</sup>。20世纪初,日本流行着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留日学生无疑深受影响。《民报》创刊号“发刊词”指出:“夫群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此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余谓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民报》宣传三民主义的理论根据是: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进化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进化的过程中,人不是盲目地被历史推着走,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应本国国情和历史的潮流,创造着历史。三民主义是基于历史进化的规律总结出来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正因为抱着这种社会历史观,他们对未来社会充满乐观精神,对三民主义十分自信,对满族这个比汉族落后的民族统治中国痛心疾首,认为它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原则的,是极端不合理的。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介绍欧洲进化的历史时,十分精辟地把握住了西方思想中精华部分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民报》也同时体现了法国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论,把它作为认识社会的依据和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汪精卫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留日期间,通过资本主义的宪法学,得到了主权在民的观念,使他抛弃了过去的“君臣主义”。他还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揭露清王朝用“君臣主义”来掩盖民族矛盾,拿这种观念消弭汉族仇恨的心理。可见,正是“主权在民”的命题,唤醒了长期沉睡的“民本”思想,使之理直气壮地举起“三民主义”的旗帜,大倡“平民主义”。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主权在民、美国的议会制度以及“依法治国”等,描绘他们未来的社会,他们借助于国家主权说,充分而细致地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害。他们以平等观衡量资本主义,看到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因为贫富分化的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他们也就部分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再以平等观观察中国的现实,得出满汉是极不平等的,无论是

兵权、政权、私权或是公权都一样。这种不平等是维系满族统治的护身符,一旦消除,清王朝必将瓦解。然而平等不但合乎道义,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保证,它使人民同心协力造就一个和睦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列宁把中国的民粹主义视为法国革命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也可以说是一场启蒙运动。

#### (四)互助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争

进化论学说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是从严复开始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惨败,给中国的爱国志士以极大的刺激。严复感于时事,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表了《原强》等文,开始介绍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进化哲学的基本要点。接着,他又译述《天演论》,1897年首刊于《国闻汇编》,1898年出版单行本。自此以后,《天演论》一再重版,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一时成为人们的习用语。辛亥革命时期,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又有了新的趋势。革命民主派把进化论同革命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他们进行民主革命的有力论据。

20世纪初,马君武翻译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此后西方和日本有关进化论的书刊不断介绍到中国,进一步武装了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曾尊崇进化论,把进化论作为宣传新文化新道德、批判封建旧礼教和反对尊孔迷信的主要理论武器。后来,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无政府主义者也主张进化论,但与原始的达尔文主义又有所不同。如克鲁鲍特金认为,道德的根源在自然界中,道德是动物所固有的本能,这种道德本能是为交往而产生的,互助原则是机体进化的基本规律和主要因素,是适用于一切动物的道德原则。因此,人的互助感、正义感和道德感“完全是先天的本能”。

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以后,和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成为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占有支配地位的哲学学说。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激进民主主义者都把进化论作为反封建的主要武器。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中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孙中山是达尔文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和传播者。他认为,整个世界从无生命的物质到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孙中山对达尔文主义的承认是有条件的,他还竭力强调人类互助。在孙中山看来,只要有人类社会,就必然有分工与互助合作,“社会”既是“互助之体”,又是“分工之场”。互助合作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没有分工,便没有合作,便没有互助。而社会分工愈多愈细,则互助合作就愈需要。因此,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一出现,就有“相助”的行为,用互助合作的方法来同自然界作斗争,以求得生存。

同时,孙中山认为,互助虽然是人类进化之原则,但人类进化的现阶段,仍然处于互助与竞争并存的时期。尽管合作、互助的原则行之于人类社会已久,但是,至少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着斗争和竞争。因此,一方面,他竭力宣传“相匡相助”、“互助以成”的原则,一方面,不忘提醒人们世间也存在着斗争和竞争。



### (五)关于东西文明异同、优劣的争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没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摧垮封建势力的存在,更没能在思想文化领域战胜封建势力,结果是: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领导了孔教运动,尊孔复古思潮与复辟势力呈合流之势。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渐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而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梁启超的这段言论发表于五四运动以后,概括了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交融的历史行程,同时也无意中阐明了“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曾经唤起人们心中的美好希望,但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却又给人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巨大的心理反差催促一些有识之士思索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对如何学习西方,对中国文明的走向等问题做出回答,从而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们力图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走出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误区,并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其实早在1916年,陈独秀就曾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说过类似的言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扰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指“西教西器”、“火器历法”、“制械练兵”之类),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多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抱残守缺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指“自由平等独立”)。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彷徨迷离之境。吾人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所说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与梁启超所说的“全人格的觉醒”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文化运动中,一些率先从中西文明之间形而下之争进入形而上之争的先知先觉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东西文明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对东西文明差异的具体分析与评论,对两种文明优劣的具体比较,却存在严重分歧与尖锐对立。

1915年夏,反袁斗争失败后避居日本的陈独秀回国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当时对社会主义还知之甚少的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宣传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主张东西文明“水火不相容”。从1911年开始执掌《东方杂志》笔政的杜亚泉,在一战前后发表论文多篇,力倡中国固有的道德观念,是“最纯粹最中正者”。

1918年,李大钊则连续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文章,力主东西文明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谁也离不开谁。一场东西文明大论战,由此拉开帷幕。

1915年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问题的论战,延续十余年,先后参与其中者有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这场论战,既是清朝末年中学西学之争的延续,又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政治矛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这场论战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如何认识传统文明的继承与创新,如何评价封建文化及资产阶级文化,如何看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他们提出了种种主张、方案、设想与建议,表明文化学者对中华文明的反省已经深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论战一直持续到1927年,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思想战线的“热点”转移到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方面,才告一段落。

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东西文明差异与优劣的比较,只是1915年开始的这场东西文化大论战的第一阶段,其间,论战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从表面、从现象上来罗列东西文明的异同与优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论战的重心集中到第一阶段已经有所提及的东西文明能否调和这一问题上,并对如何调和问题充分进行论述,章士钊、蒋梦麟、常乃德、陈独秀、李大钊等纷纷“参战”,深入地辩证地分析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并探讨两者之间相互融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该阶段的论战从比较“东”与“西”,发展到着重探讨“旧”与“新”,也就是新文明与旧文明有无实质区别,以及如何处理新文明与旧文明的关系问题,从而使认识更进一层。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梁漱溟出版震动学坛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把论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论战由此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论战内容从表面上看似又回到了比较“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优劣长短这个老话题上,但这一时期论战的实质已今非昔比。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社会以沉重的打击,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社会到底向何处去?双方论战的焦点已从抽象地讨论东西文明的关系,发展到具体地讨论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如何作用于世界文明的发展等问题。此后,论战的双方,演化成了三派,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瞿秋白等,超然于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与以胡适、张东荪、常乃德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的二元对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崭新口号。在论战过程中,力主回归传统的“东方文化派”以此为开端,逐渐形成“现代新儒家”,其后,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西化派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支撑起现代中国文化的理论大厦。

(本文系即将出版的《中国哲学大论辩》(第1卷)的绪言,综合了参写作者的观点,特做说明)

### 参考文献:

- [1]高瑞泉.中国社会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Main Abstracts

Confrontation of Ideas: the Ideological Debate in China's Thought History between 1901 and 1919

Han Qiang( 33 )

Abstract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s modern thought between 1901 and 1919,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realm of thought centered on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1911 Revolution of establishing a bourgeois democratic republic. First, the criticism was targeted to the view of fatality and the feudalistic cere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which involved the evaluation of Confucius. Second,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as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e criticism to slavish character made by Liang Qichao and Mai Menghua who brought forward the idea of building up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volving the debates between science and superstition, Atheism and Theism, and the controversy on the policies of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Finally,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clarified the thought of the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view of fatality ;Atheism ;feudalistic ceremon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cience ;democracy ; cultural innov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Transition

——On Sino-Russian economic transition

Zhang Rende Zhang Shuhui( 50 )

Abstract :Currently “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 or “ the degree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 is general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research to describe the degree of a country's economic transit to market economy. Though economic transit is related to marketization or liberaliza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refore, the degree of transition should be used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of a country. The target system of the degree of transition consists of three basic dimensions: the contract-oriented system, the administration-oriented system and the citizen's rights and freedom.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ultimate valu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need to be specified based on a country's historical process. Compared with Russia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China's degre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Russia, which means that the gradual transition is superior to radical reform.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ition; degree of transition; China; Russia

Reflection on the Increase of Proportion of Labor Compensation in Initial Distribution

Zhao Xueqing( 72 )

Abstract :the 17<sup>th</sup> Congress of CPC pointed out that the labor compensation will be enhanced in the proportion of initial distribution, which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reform syste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hat it helps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to embody the fairness of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and to increase the incomes of laborers. Mutua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aborer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in order to secure the increase of this proportion.

Key words:the labor compensation ; initial distribution ; the principle